

我的艺术生涯

■ 袁运甫

下



袁运甫先生（1933—2017）是我国杰出的艺术家，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在六十七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为国家与社会创作了大批艺术杰作，也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贡献了毕生力量。袁运甫先生以光辉的人格和博厚的学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本文特选登袁运甫先生的自述文章《我的艺术生涯》，以此向先生致敬。

跟着先生的追忆，我们可以看到美院历史上的艺术大家们如何以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兴衰为己任，孜孜以求，做艺术的探索者和领路人。

我由衷崇敬学院老一代艺术开拓者，他们奋斗的经历，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其中，张光宇教授是最年长的老师。他1890年出生，由于学校的安排，我有幸跟随他多年，向他请教，并研究他的艺术风格。他早年面向社会，创作了大量漫画和装饰画，并涉及插画、壁画、舞台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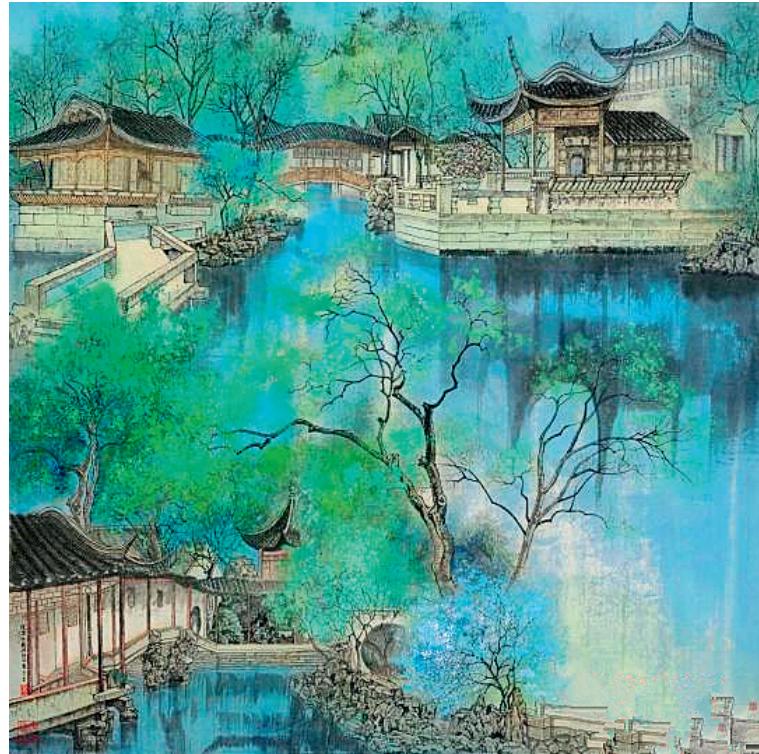
术、电影美术、实用美术设计等，他是上海30年代艺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革新家。张光宇教授很早就参与中国画改良的尝试。1934年，他用整月假期，精心创作了大幅中国画《紫石街》，因徐悲鸿先生的钟爱，当年就被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当代国画展”（该作品现藏徐悲

鸿美术馆）。这幅作品反映了光宇先生当时对墨西哥壁画表现风格的浓厚兴趣，以致在他同时期的大量漫画创作中，也体现了相似的风格倾向。60年代初，我请教他怎样考虑艺术风格的取向时，他说“我一直有所思考的是把中国的装饰和图案的艺术精神结合到中国画

中去，脑中追求的正是这种‘新中国画’”，“但我不想挂牌子，我不要什么家，我就是新时代的民间艺人，这就蛮好哇！”

庞薰琹教授比张光宇先生小5岁，我家多年与他相邻。60年代，他出任学院装饰绘画系教研室主任，我为副职，朝夕相处，因此在艺术上的交流也十分密切。他的绘画珍藏，我都有幸多次细读，受益匪浅。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

“决澜社”的主要成员。他对艺术设计领域和个人从事油画、白描画、水彩画等的研究与创作，是同步进行的。设计与绘画对他来说，不仅没有对立情势，而且是相互促进和融通的。他为此以很大经历和时间研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装饰性特色，著述了《中国历代装饰画的研究》。他有一个十分鲜明的艺术观点，曾郑重地对我说：“从比较系统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汉唐以前的广泛范围的造型艺术来看，应当有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没有没有装饰的写实，也没有没有写实的装饰。”后来，他又在为全系学生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庞先生一直到晚年仍坚持自己的油画创作与写生，同时又研究艺术字体、艺术设计，并关注工艺美术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



拙政园

他还一直希望能有时间来完成自己多年的夙愿，写一本“中国装饰艺术史”和“中国纹样史”。

祝大年教授比庞先生小11岁。他是杰出的陶瓷专家和壁画家，又是重彩画和钢笔画的著名画家。刚解放时，他受聘为轻工业部黄炎培部长的陶瓷艺术顾问，他是“建国瓷”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认为：“中国陶瓷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正是美术家与工艺家的高度结合，也是艺术与科学的高度结晶所取得的突出成果。”

我还十分怀念已故的油画大师卫天霖教授，他在中国油画界是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的

大师。他不仅后继了印象主义开拓的画风，也容纳了中国传统色彩的富丽华滋和西方光色分析的色彩表现力量。他总是强调“要有艺术推敲和超凡境界的审美表现”。卫天霖教授还是中国古玩和民间工艺美术的热心家，他特别关注民俗的、生动的、丰富的装饰艺术情趣，并在其油画作品中体现这种多样而丰富的艺术综合能力。他晚年用油画绘制屏风，在色彩追求中显示了浓重的装饰趣味和中国的审美情怀。但是，他的艺术语言却是现代的。我常想，卫老把如此辉煌艳丽的中国造型情调，巧妙地转换为西方色彩

语言，他的油画，无论从东方看西方，还是从西方看东方，都达到了无可挑剔，完美而统一。他是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奥秘，并兼得其精华。

学院还有一批杰出的已故艺术家，他们不仅仅专业设计才华出众，而且都有十分深厚的造型与装饰的功底和理论修养，其中影响深远的有雷圭元、高庄、郑可、柴扉、奚小彭等教授，他们都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先驱者。我记得早年在杭州读书时，就看到雷圭元在他的著作《新图案学》中的赤诚呼喊：“救救灵魂吧！用崇高的风格！”他呼吁中国的图案设计应当从“轻佻无谓”中拯救出来！当我回顾过往的艺术历程时，我看到在20世纪中国的艺术长廊中，这些光辉身影，正迎面走来！中国几千年的艺术文明，正是这样生生不息地阔步前进。

我院健在的著名教授，如张仃、吴冠中、尚爱松、叶喆民（编者注：几位教授如今都已逝世）等人，至今仍然一直在热情地关注着艺术和学院的进步和发展，他们都不断地以新的学术成就在引导和鼓舞着后辈努力。在这些大学者的心目中，他们最关心的始终只有国家和民族艺术的兴衰，我看到，献身的学术精神是永恒的凝聚力。在回顾我自己的艺术历程时，我动情地看到了正是这种精神引导我踏上步步莲台，我由衷缅怀和感谢我的老师们！

“文革”后，艺术教育恢复了招生，学院成立了以壁画专业为主要力量的特种工艺系，后来改名为装饰艺术系，并发展成为四个专业的建制，即壁画、雕塑、漆艺、金工四个学科。同时，教学实施了工作室制，一直由我担任了长达15年之久

的系主任。在继承过去的经验的同时，又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和改革。现在回忆起来，从五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我系学术方面，比较深入地开展了对当代艺术发展潮流的研究、对装饰性艺术的理论研究、对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的研究、对墨西哥壁画艺术的研究、对艺术形式与形式法则的研究、对中国工笔重彩绘画与线描和水墨画的研究、对多种传统工艺材料推陈出新的实践研究、关于传统工艺材料和技法的继承和创新的研究等，这些领域的开拓，我们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创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我们在漆艺、艺术陶瓷、金工、石雕、木雕，以及刺绣、编织等纤维艺术与丝、毛、棉、麻壁挂，玻璃、彩塑、屏风等手工创新实践中，



《继往开来——历史足迹与走向未来》壁画设计稿（局部）



袁运甫、袁加：高山仰止（彩色花岗岩浮雕）

都取得影响深远的成功。上述教学改革，正是为中国当代壁画、公共艺术、造型艺术、设计艺术等大美术领域完成了先期基础理论与专业技术的系统准备，本着学习——探索——实践——总结的态度，使我们研究的学术课题不断走向深化。这些研究专题，又分别结合国家与社会公共艺术的实施进一步完善、提高，有的还形成为生产能力，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国公共艺术得以更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前20年的研究成果，已经保证在材料、在工艺、在整体艺术观念指导下的创作设计与

制作方面的条件和基础。这是一项需要艰难创业的系统工程。

七十年代末，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时代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张仃院长亲自指导下，我们系的壁画专业全力投入了北京机场大型壁画群的创作、制作和组织工作。经过一年的全力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979年10月，北京国际机场大型壁画群艺术工程的顺利完成万众瞩目，这一成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好评。同时，机场壁画群创作

的成功，也证实了我们在学术积累和技术上的准备的重要意义，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艺术的进步，需要百川汇海的精神。艺术家是营造审美环境的战士，孙子兵法提出了“上兵伐谋”的思想，策划领先，智慧取胜，这才是优秀战士的品格。只是走老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是难以开拓的。我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无论在艺术教育和本人的艺术实践中，坚持“大美术”的基本观念，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艺术本身并无栅栏和禁区，为何将自己画地为牢，自闭自囚呢？现代艺术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发展，是现代中国艺术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特色。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这一伟大的变革时期，这为我们的新艺术及创作观念的更新带来机会，也为中国艺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改革思考。特别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后，以原装饰艺术系的学科为基础，发展为绘画系（含壁画和公共艺术）、雕塑系、工艺美术系（含漆艺、金工、纤维、玻璃），其他各个艺术设计学科和艺术历史与理论学科也都迎来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一个以“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和“争创国际一流”为办学目标的新思路，必将推动学院更强劲有力地发展。